

# 中美贸易顺差：根本原因在哪里？

李稻葵 李丹宁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两大经济体，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大势，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长期以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美贸易格局基本是以中国整体对外贸易顺差不断上升、美国整体贸易对外逆差不断攀升为基本背景，而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为显著特征的。这一贸易格局，自然引起了美国政府界、商界和学界的极大关注，进行了许多政策性讨论，提出了争议极强的论点。这些观点不尽正确，但却带来了极大的政策性误导，值得我们从学理上进行仔细的分析，从而在国际舆论领域不落人之后，也为我们自己的对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年来不断下降，而中国经济的储蓄率不断上升的结果，因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国的贸易顺差的本质就是储蓄过剩，逆差就是储蓄不足。

第三个理论是结构论。它认为，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是世界贸易格局变化的结果。具体说来，它认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许多产品以前是由第三国生产的，以前是统计在美国对该国的贸易逆差，而现在在这些产品由中国生产，由此产生的逆差算在了中国经济这边。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些产品往往是最后的组装在中国完成，所以中国的出口量乃至中国的贸易顺差被大大夸大了。Feenstra, Hai, Woo, Yao (1999) 比较早的提出了结构论和储蓄论，以此解释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他们文章并没有对两者的重要性和解释力给出定量的检验。

第四个理论可以称为重商论，它认为中方在对国际市场出口，包括对美国出口，有大量的政策的鼓励和制度的激励，人为地导致大量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相反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受到了种种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限制，以至于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阻力非常大，致使两国贸易不平衡。这一观点最近由一位美国学者提出，在美国比较流行。我们的观察是这一理论虽然由美国学者总结提出，但是在美国政界的流行程度远远超出在学界的认同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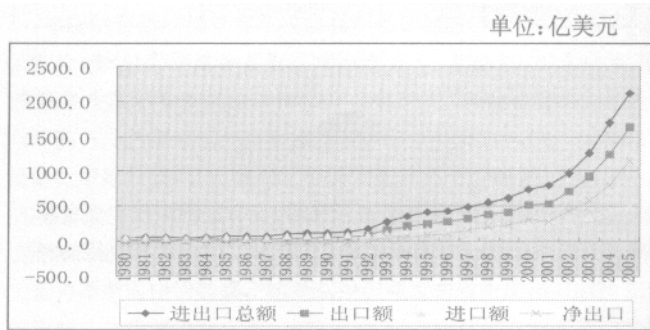
很显然四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和推论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有必要仔细分析。以下我们将一一剖析这些理论的解释力，最后讨论相应的政策含义。

## 1. 汇率论

我们的基本结论认为这两种观点从经验分析角度上来考虑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关于这一理论，尽管政策界讨论很多，可系统深入的经验分析却是少而又少。我们查找了最近十年来国内外的有关文献，直接讨论中美贸易的文章是非常少的。Chou (2000) 是少有的比较系统地分析中美贸易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学术论文。该文发现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的波动（具体说来是条件方差）对于中国对美国出口具有负面效应。也就是说当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对美元波动很大的时候，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相应减少。必须注意的是这一分析并没有提出人民币对美元实

图 1 中美贸易 1980-2005 年趋势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0 到 2005 年)

总的说来，政策界及学术界对于中美贸易格局的成因有四个非常流行的理论解释。大概按照我们的对这些理论的流行程度的判断，从高到低一一列出。

第一个解释不妨称为汇率论，可能是最流行的观点，它认为中国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人为地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所引起的，而人民币汇率的压低导致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形成了非自然的竞争优势，因此导致了大量的贸易顺差。汇率论的推论自然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是中美贸易恢复平衡的根本性前提。

第二个理论是储蓄论，它认为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是中美两个经济体储蓄率的不同所导致的。这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储蓄率近

际汇率或名义汇率的汇值本身对中美贸易的格局有任何影响,它只是分析了汇率的波动性。该文的政策含义当然是不明确的,因为政策制定者不应该人为地扩大汇率的波动性以此来减少出口。汇率波动性的增加对出口的减少应该说是一个福利减少的结果,因为汇率波动增加导致了出口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出口商的福利下降,对于进口商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张曙光(2005)、卢向前和戴国强(2005)的文章分析的是中国对整体外国贸易格局的问题。两篇文章都是以中国对世界的贸易,而不是中美贸易为对象的。

卢向前和戴国强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方法对 1994-2003 年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加权实际汇率波动与中国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影响显著,Marshall-Lerner 条件成立,并存在 J 曲线效应。同时张曙光测度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函数和进出口函数及其汇率弹性,估算了不同幅度汇率升值的成本,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和出口贸易减少的数量,以及由此带来的 GDP 和就业人数减少的规模。其中他们发现汇率升值对进出口额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三个季度后下降了一半以上,七个季度以后近于消失。

他们的发现从一定程度上分析了人民币汇值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但张曙光(2005)的文章尚未考虑人民币以及出口贸易额时间序列的单位根问题,而同期卢向前和戴国强(2005)的文章注意到了单位根问题。在时间序列出现单位根时,简单的最小二乘法回归是不合适的,它的结果是没有一致性的(inconsistent,即,回归结果不会随着样本的增加而收敛)。

笔者最近对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对于中美贸易的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经验分析(详见李稻葵,李丹宁,2006)。我们收集了 1980-2004 年中美贸易的宏观数据。经过仔细地时间序列调整,发现汇率、进出口额都具有单位根,因此必须进行相应的时间序列处理,具体说来,必须对相关变量进行差分。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的变化都没有任何统计上显著的相关性,而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一个正统计上显著的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占中国经济的规模。(见表 1)由于涌入中国 FDI 很大程度上是国际生产能力转向中国的表象,所以我们的计量经济学的分析可以理解为支持了上述的第三种理论,即,结构论。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外商直接对华投资的变化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有显著影响,当 FDI 增长 1%时,出口增长 0.376%,而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对出口影响均不显著。另外,表中还得出中国从美国进口额也同样不受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影响。

图 2 1980-2004 年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名义汇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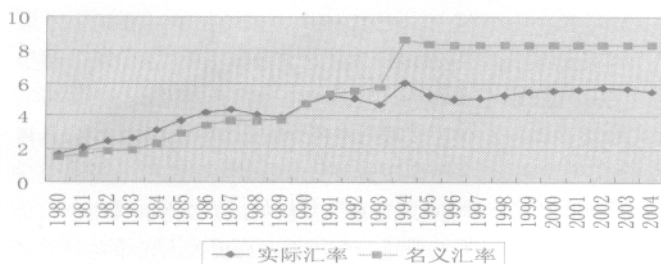


表 1 中国与美国 1980-2004 年进出口贸易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美国 GDP 取自然对数后差分	FDI 取自然对数后差分	名义汇率差分	实际汇率差分	1993 到 2004 年哑变量	调整后 R <sup>2</sup>
出口额取自然对数后差分	0.826 (1.22)	0.376*** (4.32)	0.005 (0.15)		0.126*** (3.07)	0.45
出口额取自然对数后差分	0.850 (1.19)	0.377*** (4.22)		0.001 (0.02)	0.125*** (2.96)	0.45
	美国 GDP 取自然对数后差分	关税取自然对数后差分	名义汇率差分	实际汇率差分	1993 到 2004 年哑变量	调整后 R <sup>2</sup>
进口额取自然对数后差分	0.882 (1.25)	3.576* (1.85)	0.065 (1.09)	0.081 (1.38)		0.11
进口额取自然对数后差分	1.175 (1.56)	2.884 (1.49)		-0.001 (-0.01)	0.080 (1.27)	0.05

数据来源:李稻葵、李丹宁:《中美贸易余额要素分析:汇率、储蓄与世界贸易结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讨论稿。

总之,从现有的计量经济分析来看,没有证据表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有直接的相关性。

## 2. 重商论

对于第二种观点,即中国的贸易体制和政策导致了中美贸易顺差。比较系统的经验分析是困难的。因为这些政策性、体制性的数据难以测量和收集。但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方法加以检验。如果说中国经济对于出口有相当的鼓励作用,对于进口又有相当的限制作用的话,这种政策对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应具有普遍效应。我们可以对照来看中国对日本及中国对韩国的贸易结构转变。

从表 2 列出的中日和中韩的贸易结构来看,过去 20 年来,并没有出现中美贸易那样大规模的变动。如果中国确实实行重商主义,我们会预期中国对日本及韩国等国也出现像对美国那样的大规模顺差,但事实相反,中国对日本在 2002 年由顺差变为逆差并持续增大,而中国对韩国的逆差从 1991 年起一直在扩大。因此很难支持中国的贸易政策和体制对中美贸易不平衡有影响。

表 2 1990-2005 年中日和中韩的贸易结构

	中国对日本			中国对韩国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贸易余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贸易余额
1990	202.8	90.1	112.7	32.4	12.6	19.9
1991	75.9	100.3	-24.4	6.8	10.7	-3.8
1992	116.8	136.8	-20.0	24.0	26.2	-2.2
1993	157.8	232.5	-74.7	28.6	53.6	-25.0
1994	215.8	263.3	-47.5	44.0	73.2	-29.2
1995	284.6	290.0	-5.4	66.9	102.9	-36.0
1996	308.9	291.8	17.1	75.0	124.8	-49.8
1997	318.2	289.9	28.3	91.2	149.3	-58.1
1998	296.6	282.8	13.9	62.5	150.1	-87.6
1999	324.1	337.6	-13.5	78.1	172.3	-94.2
2000	416.5	415.1	1.4	112.9	232.1	-119.2
2001	449.6	428.0	21.6	125.2	233.9	-108.7
2002	484.3	534.7	-50.3	155.3	285.7	-130.3
2003	594.1	741.5	-147.4	200.9	431.3	-230.3
2004	735.1	943.3	-208.2	278.1	622.3	-344.2
2005	839.9	1004.5	-164.6	351.1	768.2	-417.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 到 2005 年)，2005 年数据来自中国海关网。

3. 结构论

从中国角度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贸易结构逐步从出口农产品和初级产品，转向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出口加工制成品的贸易。推动这一贸易格局变化的一个重大因素是不断涌入中国境内的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主要进行绿地投资，直接拉动了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而中国经济的崛起，尤其是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断吸引外国制造商把生产能力逐步转移到中国，从而把出口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生产加工能力不断向中国转移。这是从中国角度来看中国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从美国角度来看，过去十几年来面对日本经济出口的挑战，从 80 年代中开始，美国经济不断转型，逐步由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和研发行业，其生产制造设施和生产制造能力也转移到各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中国，这也是美国自身经济结构改变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经济制造业的不断上升及美国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美国本土向研发和服务业集中，生产加工能力日益依赖于外国制造业来提供，而这种生产加工能力进一步集中到中国，这样的基本格局逐步成形。所以这是影响中美贸易发展的第一个因素。

如何定量地分析上述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呢？我们最近的一篇研究提出了一套方法（详见李稻葵和李丹宁 2006）。基本思想如下。为了讨论世界贸易格局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不妨把中国与美国一起称为 A，把世界其它国家称为 B。的确在 1990 年和 2000 年间 B 对 A 的贸易余额产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假如 1990 到 2000 年间 B 与 A 的贸易结构没有改变，那末

2000 年 B 对 A 的贸易余额在中美之间的分配应该和 1990 年 B 对 A 的余额在中美间的分配一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计算出一个假想的 2000 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余额，这一贸易余额保留了 1990 年的世界贸易结构。2000 年实际的中美贸易余额与这个假想的贸易余额的差距，就是 1990 年到 2000 年间由于世界贸易余额的变化所带来的部分。对 2000 年到 2005 年间的贸易余额变化情况，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同时我们利用中美各自的对外贸易余额变化趋势，将中美贸易余额变化中由储蓄变化解释的部分进一步细分为中方因素和美方因素。中美 1990 年到 2005 年贸易余额变化的因素分解的结果见表 3。

图 3 中美 1990-2005 年贸易余额变化的因素分解计算方式  
单位：10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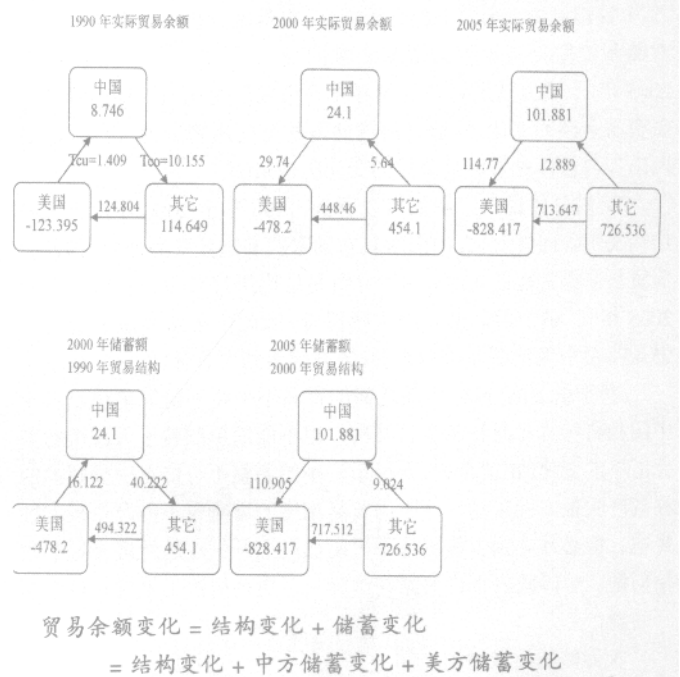


表 3 中美 1990-2005 贸易余额变化的因素分解

	1990-2000	2000-2005
世界贸易结构	43.7%	4.55%
中美储蓄差	整体	56.3%
	中方因素	2.3%
	美方因素	54.0%

数据来源：同表 1。

4. 储蓄论

其它情况不变，两国之间储蓄率的变化会导致两国贸易余额的变化。储蓄率上升的国家相对储蓄率下降的国家的贸易余额会上升。中国宏观经济的储蓄率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到了 90 年代中期，又提升到一个更新的层次。中国储蓄率的上升有其深刻的经济和制度原因。中国的人口结构非常年轻，大量的年轻人处于储蓄阶段。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人均可支配收入

不断上升,而民众的消费尚未完全跟上收入水平提升的变化,消费相对滞后,这也造成储蓄率不断上升。而中国企业尚未面临严格的公司治理体制的约束,造成大量的企业自有资金没有通过红利的形式分配出去,这也造成企业的储蓄率不断上升。另外经常提到的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开放中逐步丧失其相对重要性,也促使民众不断地提高储蓄以求自保。

美国的情况与中国经济恰恰相反。美国的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不断高涨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由于民众已经拥有的资产组合不断升值导致消费上升。财富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纸面效应,而消费是实际效应,所以纸面财富上升导致实际消费上升,实际消费上升导致储蓄率下降,所以美国经济处于一个低储蓄率的周期。同时美国经济随着早年婴儿出生潮步入老年阶段也使得美国消费上升储蓄下降。

我们可以沿用以上的分析方法,定量地分析由于中美两国相对储蓄的变化所导致的贸易余额的变化。事实上,从1990到2005年,上述方法所讨论的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所不能解释的中美贸易余额的变化,恰恰是两国储蓄的变化所带来的,因为,这是两国各自总体对外贸易余额的变化所带来的。

所以总体说来,我们可以看到,1990年至2000年由于贸易结构发生方向性变化,中国对其它国家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因此中美贸易余额变化的43.7%由世界贸易结构所带来的。而2000年至2005年间,由于美国储蓄率大幅降低,因此中美贸易余额变化的95.45%由中美储蓄差所带来的,美方因素则占总体的78.11%。

基于以上的分析,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国独特的贸易政策和贸易结构,也不能简单归咎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也就是说,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不可能对中美贸易的格局产生根本性影响,而中国贸易深度的影响也不能产生根本性影响。但必须看到中美贸易不平衡已经上升到超越经济领域的政治问题。中国政府也许要站在国际关系更高层次上把握和调整这一问题。

#### 5.简短的政策讨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有五个方面的政策方向可以探讨,从而缓解中美贸易顺差加大带来的政治压力。

第一,要充分意识到中美贸易的政治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舆论造成的,而舆论又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术层面的讨论所左右的。舆论的制高点必须占领。从舆论上化解针对中国出口的压力,对外舆论工作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美和对外的宣传工作,要从理论上、学术上向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府官员说明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余额实际上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双方贸易不平衡的根源是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其次是双方储蓄率差距的加大所带来的影响。

第二,既然贸易结构是影响中美贸易余额的重要因素,可以考虑适当协调出口企业的国别结构。应该意识到中美贸易不平衡会产生一系列国际贸易的影响。要通过政府政策来宣传和引导中国出口企业来建立贸易政策风险的意识,开辟新的出口贸易市场,避免过分集中于美国或其它单个国家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第三,由于中国宏观经济储蓄率上升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那么要从降低中国宏观经济的储蓄率入手。而中国宏观经济的储蓄率不仅取决于家庭储蓄(短期内政府对于家庭储蓄率影响力有限),更主要的是企业储蓄(企业储蓄往往和投资是紧密相联的)。企业储蓄的来源是留成利润和未分配资金。所以加强公司治理水平,强制企业分红,包括国有企业分红(上缴利润),变得极为重要。

第四,给定美国经济储蓄率目前处于比较低的阶段,其未来未来储蓄一定会上升,因此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反美国经济周期运作,即,适当地提前满足中国经济对于美国产品和资本品的需求。如鼓励中国的大型公司提前从美国进口机器设备,而由此产生的汇率风险可以通过国家专款的形式给予补助。这是一种化解政治风险的运作,因为其目的是为了减少美国在经济周期之间的贸易逆差的波动,缓解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压力。

第五,继续调整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尤其要控制生产能力的过度增长和不合理变化。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导致的生产能力的增长,不仅造成中国经济的浪费,也给未来的中国金融体系造成巨大的负担,为今后经济的衰退埋下苦果。而且生产能力的过度增加也导致国际政治影响,导致了短期内对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出口盲目地上升。

#### 参考文献:

1. Chou, W. L., Exchange Rate Variability and China's Expor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ume 28, Issue 1, Mar., 2000, Pages 61- 79.
2. Feenstra, Robert, Wen Hai, Wing Tye Woo, Shunli Yao: The U.S. - China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Its Size and Determina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99, 338- 343.
3. 张曙光:《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4. 卢向前、戴国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1994-2003》,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5. 李稻葵、李丹宁:《中美贸易余额要素分析:汇率、储蓄与世界贸易结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讨论稿。
6. 张斌:《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钉住美元还是一揽子货币》,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1-2期。
7. 胡鞍钢:《关于中美贸易和汇率问题分析与建议》,载《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7-8期。
8. 平新乔:《产业内贸易理论与中美贸易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9-10期。
9. 朱民:《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1-2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